

国际刑事法院与苏丹达尔富尔问题^{*}

刘鸿武¹, 王 猛²

(1 浙江师范大学 非洲研究院, 浙江 金华 321004; 2 西北大学 中东研究所, 陕西 西安 710069)

摘要:近年来,苏丹达尔富尔问题日趋演化成一个国际性的政治热点。2008年7月国际刑事法庭检察官提交起诉书,指控苏丹总统巴希尔犯下种族灭绝等多项罪行。这一事件对达尔富尔问题将产生复杂影响。论文分析了国际刑事法院与达尔富尔问题的关系、未来走向及影响与后果。

关键词:国际刑事法庭; 达尔富尔; 巴希尔

中图分类号: D 81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035(2008)06-0001-06

2005年3月31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1593决议,将苏丹达尔富尔冲突情势问题移交国际刑事法院审理。按照这份决议,苏丹政府和达尔富尔冲突各方应与国际刑事法院及其检察官合作,并提供必要的援助。决议也要求检察官在决议通过后三个月内和以后每六个月,向安理会说明根据本决议采取的行动。这一决议通过后,国际社会一直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不知国际刑事法庭将做出何种行动。

2008年7月14日,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奥坎波正式向国际刑事法院预审庭提交报告。报告指控苏丹总统巴希尔“基于政治动机”命令政府军和阿拉伯裔民兵对祖居达尔富尔的黑人族群民族富人(Fur)、马萨里特人(Masalit)和扎加瓦人(Zaghawa)实施种族屠杀,犯下种族灭绝等多项罪行,要求法庭向巴希尔发出逮捕令。¹

在达尔富尔局势渐趋平稳、苏丹政府与联合国及国际社会就达尔富尔问题的合作也取得进展的时候,国际刑事法庭对苏丹总统的刑事起诉引起了国际社会有关各方的强烈反应,各方态度互

有不同。从目前情势看,这一事件将对达尔富尔问题产生复杂的影响。由于这也是国际刑事法院成立以来首次对一个在位的国家领导人提起指控,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也会是多方面的。

一、国际刑事法院及其管辖问题

国际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CC)是根据联合国1998年7月17日外交全权代表会议通过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又称《罗马规约》)的规定,于2002年7月1日正式成立的。共设有18位检察官,1个检察官办事处,1个预审庭,1个审判庭和1个上诉庭。检察官经选举产生,任期9年,不能有两位检察官来自同一个国家,首批18名检察官2003年3月在荷兰海牙宣誓就职。

根据规定,国际刑事法院在《罗马规约》(以下简称《规约》)获得60个国家的签署和批准后成立。至2006年11月1日止,全球已经有134个国家签署了《规约》,104个国家批准了《规约》,其中非洲国家29个,美洲国家23个,欧洲国

* 收稿日期: 2008-09-24

作者简介: 刘鸿武(1958-),男,云南西双版纳人,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 王 猛(1973-),男,陕西西安人,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讲师,中东史博士。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非关系全面提升背景下中国如何在非洲与西方化解利益冲突、实现合作多赢问题研究”(07XGJ006)

家 37 个, 亚洲国家 9 个 (阿富汗、柬埔寨、约旦、东帝汶、韩国、塔吉克斯坦、格鲁吉亚、蒙古、塞浦路斯)。至《规约》通过十周年的 2008 年 7 月, 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总数达到 106 个。

国际刑事法院是一个永久性的国际司法机构, 检察官将根据国际刑事法院预审法庭的同意, 应某个国家或联合国安理会的请求对罪犯进行起诉, 但是只追究个人的刑事责任, 而且是在各个国家所属的法院不能自主审理的情况下才可介入。根据规定, 国际刑事法院只审理 2002 年 7 月 1 日以后发生的案件。

国际刑事法院的设立, 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二战后为制裁战争暴行而制定的许多国际刑事审判的规约和章程, 如《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以及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等, 已奠定了国际刑事法庭成立的法律基础。20 世纪 90 年代, 在卢旺达、南斯拉夫发生的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引起国际社会普遍关注, 联合国先后设立两个国际刑事特别法庭, 负责对发生在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境内的反人类罪行进行审判。冷战结束以来, 为了对付日趋增多的各类跨国犯罪, 加强和完善惩治跨国犯罪的国际立法, 以及国家间的司法合作已经成为当今国际社会与跨国犯罪做斗争的重要环节。^④

根据《规约》, 在判定某个国家的司法体系不能或不愿对有关罪行进行调查或起诉的情况下, 国际刑事法庭有权对国家、检举人和联合国安理会委托其审理的案件进行审判, 追究个人的刑事责任。检察官则根据预审法庭的同意, 应某个国家或联合国安理会的请求对罪犯进行起诉。

国际刑事法庭虽然是根据联合国的决议成立的, 但国际刑事法庭与联合国却不存在直接隶属关系, 它们是一种互补性的合作关系, 联合国所从事的促进和平、发展和人权的工作, 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国际刑事法庭在建立法治方面所做的努力。为有效地惩罚种族灭绝等四项严重的国际罪行, 《规约》设定了国际刑事法庭可以对非缔约国国民行使管辖权的几种情况, 包括犯罪行为在某一缔约国境内发生、被告人为某一缔约国国民、安理会提交情势启动法院管辖权、非缔约国提交声

明接受法院对有关犯罪行使管辖权等。尤其当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授权而将相关“情势”提交给国际刑事法庭时, 按照联合国的集体安全体制, 国际社会的全体成员均有义务服从、执行和配合, 国际刑事法庭管辖权的行使因此而具有了强制措施的特点。⁽⁵⁾一旦检察官决定启动调查, 即便还没有真正地进入司法程序, 甚或法官最终没有批准启动调查, 但宣布调查本身已是一种有明确含义的信息, 势必给相关各方造成压力或影响。

但从国际刑事法庭成立之日起, 国际社会对其的争议就不断。由于国际刑事法庭检察官的情报来自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个人及媒体等所有渠道, 检察官个人的价值取向和判断对于是否启动调查具有决定性作用, 因而其公平与合理性问题就一直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

二、国际刑事法庭指控苏丹总统巴希尔的过程

自 2002 年成立以来, 国际刑事法院先后接受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中非、科特迪瓦四国的要求开展了情势调查。

2004 年 9 月 18 日, 安理会第 1564 号决议要求成立专门的国际调查委员会, 调查达尔富尔地区违反人权和人道主义法的情况。2005 年 1 月 25 日, 达尔富尔国际调查委员会依照联合国安理会第 1564 号决议, 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了关于达尔富尔地区发生情势的报告, 指控 51 名苏丹人在达尔富尔实施了“战争和危害人类的罪行”, 其中既有政府军政官员, 也有亲政府游击队和反政府武装组织成员, 报告建议由国际刑事法庭对这些人进行审判。

2005 年 3 月 31 日, 安理会通过了向国际刑事法庭提交苏丹达尔富尔地区发生情势的决议, 规定将涉嫌在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犯有“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的相关人员交由国际刑事法庭审判。检察官随后收到了国际调查委员会的一系列文件并会见了 50 位独立专家。

2005 年 6 月 6 日, 在收集和评估了所有相关信息后, 国际刑事法庭决定受理安理会提交的有关达尔富尔情势的案子, 并保证公正独立地集中对发生在达尔富尔地区的严重罪行负有责任的个

人进行调查,同时要求有关国家在收集证据等方面提供合作。⁴⁴这是安理会根据《罗马规约》向国际刑事法庭提交的第一个情势,也是国际刑事法庭首次在没有经过所涉国家同意的情况下启动调查程序。

但苏丹在2000年9月1日签署《规约》后一直没有批准该规约,因此在法律上属于《规约》的非缔约国或第三国,还不是国际刑事法庭的成员国。从条约只对缔约国适用的国际法一般原则来看,国际刑事法庭对苏丹公民没有管辖权,苏丹也没义务执行该法院的决定。苏丹政府对国际刑事法庭一直持否定的态度,认定其是一个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和弱国“实施和强加文化优越性的工具”。⁴⁵

在国际刑事法庭检察官决定对达尔富尔情势进行调查前后,苏丹政府自己首先启动了本国的司法程序来抵制国际刑事法庭的管辖权,先是在2005年3月下旬逮捕了被指控在达尔富尔地区无端烧杀抢掠的15名军警人员,随后于6月中旬成立了达尔富尔特别法庭,负责审理160名在西达尔富尔地区犯有战争罪的犯罪嫌疑人。苏丹政府成立特别法庭是一件积极的事情,因为从理论上说,如果苏丹政府启动了刑事诉讼程序,为维护国际刑事司法的“一罪不二审”原则,国际刑事法庭就应停止其调查程序。

然而,国际刑事法庭却不接受这一说法,并宣称苏丹设立的特别法庭不能替代国际刑事法庭,因为苏丹特别法庭起诉的对象是低级别的犯罪嫌疑人,而国际刑事法庭将集中对在达尔富尔地区所犯罪行负有最严重刑事责任的个人进行调查。事实上,安理会将达尔富尔情势移交国际刑事法庭事件本身已经暗含了这样一个判断,即苏丹在制裁相关罪行方面是一个“不能够”与“不愿意”的国家。这个判断对苏丹司法体系和法律制度非常不利。⁴⁶

2007年2月,检察官路易斯·莫雷诺-奥坎波向国际刑事法庭提起公诉,指控苏丹前内政部长哈伦及西达尔富尔地区阿拉伯民兵武装组织坚杰维德(Janjaweed,阿拉伯语,意为“骑马带枪的人”)前指挥官阿里·库沙布,认为他们应共同对51项被指控的危害人类罪行和战争罪行负责。

其中哈伦被指在2003年初负责达尔富尔安全事务后,为坚杰维德民兵提供了资金和武器,支持对反叛者家乡的村庄和城镇肆意袭击。5月,国际刑事法庭正式向两名在达尔富尔屠杀平民的肇事者发出逮捕令,随后又向其他4名涉嫌在达尔富尔实施犯罪的苏丹公民签发了逮捕令。国际刑事法庭关于达尔富尔案件的诉讼程序进入了实质阶段。苏丹政府坚称本国享有独立的司法管辖权,以不是成员国为由拒绝执行国际刑事法庭的逮捕令。⁴⁸

2008年7月14日,检察官奥坎波向预审庭提交“证据”,指控苏丹总统巴希尔“基于政治动机”命令政府军和阿拉伯裔民兵对祖居达尔富尔的3个少数民族富人(Fur)、马萨里特人(Masali)和扎加瓦人(Zaghawa)实施种族屠杀,致使3.5万人死亡,150万人流离失所,在达尔富尔地区犯下3项种族灭绝罪、5项反人类罪和2项战争罪,要求法庭向巴希尔发出逮捕令。⁴⁹

三、相关方对国际刑事法庭指控巴希尔的反应

国际刑事法庭起诉巴希尔后,国际社会的反映不一,总体上看是欢迎者少而担忧者多。

表示欢迎的主要是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反政府武装和西方的一些非政府组织。SLM认为指控巴希尔总统本身表明他们的斗争已经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国际刑事法庭以实际行动向那些制造种族屠杀的罪犯发出了明确信息,逮捕令的签发将是国际正义胜利的标志。曾于5月进犯喀土穆的JEM宣布在国际刑事法庭提出指控的当天搁置一切军事行动以示支持,谴责非盟保护独裁者而忽视非洲人民。⁵⁰一些报刊也对国际刑事法庭的指控大声欢呼,认为这是制止达尔富尔危机的一个有力举措,是国际社会为达尔富尔做的一件正确的事情,要求巴希尔总统自己拿出无罪证据而不要继续挑衅国际社会。⁵¹

与此同时,其他相关方则对国际刑事法庭此举表示了担忧,担忧苏丹政府在不退让的窘况下会有过激反应,而苏丹反政府武装则可能因此更加强硬和不妥协,从而会大大增加政治解决达尔富尔问题的难度。⁵²对有关国际刑事法庭指控巴希尔是出于纪念《罗马规约》通过十周年的说

法, 检察官奥坎波予以否定, 称他的职责就是调查达尔富尔危机, 不会考虑政治因素。¹² 然而, 目前国际刑事法庭尚属尝试阶段, 应采取慎重态度确保案件来源的无争议性, 重视案件的质量而非数量。如果它最初受理的几个案件能够成为今后审判工作的典范, 不仅有助于向所有非缔约国展示国际刑事法庭审判工作的独立性和有效性, 而且能够以公正和有效的刑事审判活动吸引非缔约国批准《罗马规约》。¹³ 一些人担心, 国际刑事法庭在自身权威还不充分的情况下, 贸然提出对一位非缔约国现任国家首脑的指控, 恐怕在实际效果上不仅会恶化相关事态, 而且也是对自身权威的一种损害。

表示最强烈反对态度的是苏丹政府。苏丹政府认为, 国际刑事法庭在达尔富尔危机有所缓解的时候却提出对苏丹总统巴希尔的指控, 是另有图谋。

7月13日, 即指控发出的前一天, 苏丹内阁紧急开会商讨应对之策, 重申苏丹不承认国际刑事法庭对该国公民拥有管辖权, 也不会执行该法院的任何决定。执政的全国大会党认为指控巴希尔是“不负责任的卑鄙的政治敲诈”, 多数反对党也警告说, 国际刑事法庭如果向巴希尔发出逮捕令, 将使苏丹这个非洲大国“宪政崩溃”, 并给苏丹的和平机会带来损害。数千苏丹人在首都喀土穆游行示威, 抗议国际刑事法庭干涉苏丹事务, 认为国际刑事法庭在达尔富尔危机有所缓解的时候却提出了对苏丹总统巴希尔的指控, 有“明显政治动机”。

7月17日, 苏丹第一副总统兼南方政府主席萨尔瓦·基尔通过其驻肯尼亚代表处发表声明, 认为国际刑事法庭的指控“导致了可能危及苏丹和平与稳定的严重局势”, 呼吁苏丹民族团结政府在一个星期内制定一份解决达尔富尔问题的计划, 并表示愿意动用一切外交资源帮助苏丹民族团结政府与国际社会就达尔富尔问题达成共识。

7月22日, 苏丹总统顾问马勒瓦勒警告说, 逮捕巴希尔总统的企图将粉碎任何结束达尔富尔地区冲突的希望, 如果国际刑事法庭发出逮捕令, 苏丹政府将不能确保达尔富尔地区国际援助和维和人员的安全, 并可能会收回他们的签证。

对国际刑事法庭指控巴希尔最紧张的是联合国, 在指控发出次日即开始从苏丹撤出非核心部门人员。潘基文秘书长发表声明, 称国际刑事法庭的司法程序独立应该受到尊重, 但强调联合国关于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的立场没有改变, 希望巴希尔总统理智对待国际刑事法庭的指控, 全力保证在达尔富尔地区维和人员和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的安全, 保持与联合国的全面合作。不断有报道说安理会有意延缓 ICC 对巴希尔的指控。¹⁴

阿盟和伊斯兰会议组织也在国际刑事法庭指控发出后立即发表声明, 警告此举可能对苏丹国内和平以及达尔富尔地区稳定产生消极影响, 后果危险。7月19日, 阿盟成员国外长紧急会议一致认为国际刑事法庭指控“有失公允”, 反对“任何将国际司法原则政治化的企图”, 反对利用国际司法原则损害独立国家的安全、稳定和统一, 要求给予政治解决达尔富尔和苏丹问题以优先权。穆萨秘书长会后对苏丹进行访问, 向巴希尔提出一项旨在阻止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指控、促进达尔富尔问题得以尽快解决的行动计划。7月21日, 非盟发表声明请求安理会将国际刑事法庭的指控延缓一年, 认为起诉巴希尔将会使苏丹因产生“军事政变”而陷入“完全的政治混乱”。¹⁵

众多阿拉伯和非洲国家纷纷表态反对, 认为国际刑事法庭指控巴希尔总统是对苏丹局势不负责任的处理方式, 将使苏丹政府与反政府武装就政治谈判所作的努力面临毁灭威胁, 是“对苏丹内部事务及所有阿拉伯国家事务的严重和不可接受的干涉”; “起诉一个享有司法豁免和独立权的主权国总统的做法越过了所有的红线”, 将“引发不必要的混乱, 妨碍达尔富尔地区的和平进程, 同时也对苏丹政局的稳定构成极大的负面冲击”; 国际社会应该设定“路线图”和时间表, 齐心协力地通过政治途径在苏丹实现公平与正义。

世界大国对国际刑事法庭指控巴希尔总统也有不同反应。欧盟此前已呼吁苏丹与国际刑事法庭进行建设性合作, 并威胁要进行新的制裁。法国在指控发出后表示不会反对国际刑事法庭的决定, 但国际社会必须与巴希尔保持对话。俄罗斯希望安理会能搁置国际刑事法庭对巴希尔的指控。一贯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立场强硬的布什政

府,居然引人注目地呼吁国际刑事法庭和苏丹“两边”都保持克制,强调联合国在解决达尔富尔地区冲突中的重要作用。美国的前苏丹问题特使纳齐奥斯坦担心国际刑事法庭的指控会使苏丹领导人更不妥协,苏丹可能因此而发生广泛的暴力和流血冲突。中国对国际刑事法庭起诉苏丹领导人深感忧虑,希望有关各方以理性、合作和建设性的态度通过协商解决分歧,避免达尔富尔局势因苏丹领导人被起诉而复杂化,从而给达尔富尔问题的解决增加新的复杂因素,干扰甚至损害各方合作的气氛。中国和国际社会一道推动解决达尔富尔问题的决心不会改变,任何有利于达尔富尔问题得到长远和妥善解决的方案、动议或行动,中国原则上都持合作和开放的态度,愿意通过协商、协调的方式加以处理。

2008年7月31日,安理会通过的第1828号决议对国际刑事法庭起诉巴希尔总统一事的措辞是:“注意到7月21日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第142次会议的公报,考虑到该理事会成员就2008年7月14日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提出申请后的可能事态发展所表示的关切,并注意到他们打算进一步审议这些事项”。安理会成员国在决议内容上的分歧即与此段文字有关。多数成员国认为这个段落反映了非盟、东盟、伊斯兰会议组织和不结盟国家多方的关切,关切苏丹政府和联合国之间的相互信任将受到损害,关切达尔富尔各武装派别会认为他们加入和平进程、尝试通过妥协达成协议激励将不复存在。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在决议通过后表示,必须以一种平衡的方式来处理和平与正义的问题,中国支持安理会尽快采取措施,中止国际刑事法院起诉苏丹领导人。美国对1828号决议投了唯一的弃权票,其常驻联合国副代表沃尔夫(Alejandro Wolff)认为,这个段落在国际社会努力消除有罪不罚的气氛、处理达尔富尔的正义与罪恶问题的重要时刻发出了错误的信息,它暗示苏丹政府也许还有摆脱的办法。

四、苏丹政府与国际刑事法庭关系前景

鉴于奥坎波检察官过去起诉的11个案子都未遭驳回,此次指控巴希尔的成功率估计也比较

大。然而就算国际刑事法庭同意签发逮捕令,恐怕签发的也是一张空头逮捕令。

首先,逮捕令的执行是一个大问题。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呼吁非洲各国形成统一立场,联合抵制国际刑事法庭介入达尔富尔问题,东盟也专门做出决议支持巴希尔总统。在没有苏丹周边国家参与合作的情况下,任何西方国家的军事力量进入苏丹都可能面临“二度殖民侵略”的指控,是否会重演当年殖民地国家集体对抗前宗主国的局面也未可知。因此,没有苏丹内部势力的配合,无论是美英法德的情报部门还是北约特种部队,没有哪一家会不计后果地执行国际刑事法庭的这张逮捕令。

其次,巴希尔总统有着相当大的回旋空间。被通缉13年之久的卡拉季奇在2008年7月最终被捕,但这并不全是正义的胜利。卡氏能长期“大隐”于贝尔格莱德闹市是塞尔维亚政府的放任,突然遭捕也是塞政府的需要,经济困顿的塞尔维亚需要拿他来敲开加入欧盟的门槛。但苏丹经济自进入新世纪以来发展迅速,南北内战也从2005年开始渐趋结束,民族团结政府的合作框架运转正常。凭借经济成就积淀起来的战略硬实力和政府声望,巴希尔总统强力主导着苏丹的国家机器,对内足以挫败反对势力的任何企图,似乎没有祸起萧墙之忧。在对外关系方面,苏丹政府也能够找到足够的盟友和支持力量,在国际社会不会四面楚歌孤立无援。正因为如此,苏丹政府才一贯对国际刑事法庭指控喀土穆高官不屑一顾,拒绝向国际刑事法庭移交任何苏丹国民,即便此次面对指控总统本人的局面,非但承诺不对驻苏丹的联合国人员实施报复,反而誓言用尽一切外交手段洗刷国家名誉。与苏丹官员的警告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担心相反,巴希尔总统在他自2007年以来的首次视察达尔富尔时当众跳舞,以此来蔑视他被传有可能会因参与大屠杀而被捕的事实,并称维和人员是苏丹的“客人和伙伴”,表达了与国际社会的合作愿望。¹⁶

虽然国际刑事法庭的指控近期不会对苏丹产生实质性影响,但苏丹如长期以拒绝批准《规约》的方式消极抵制国际刑事法庭,也会面临许多问题。事实上,苏丹政府应该在积极推进达尔富尔

问题解决的同时, 充分关注国际刑事法庭的动向, 在国际社会主动寻求应对之策, 以日益完善的法治手段推动苏丹的社会转型和民族国家建构。

注释:

¹ À Ram i G. Khouri “Whose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uly 17, 2008.

④张胜军:《国际刑事法院的普遍管辖权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8期,第21页。

(四)刘大群:《论国际刑法中的普遍管辖权》《北大国际法与比较法评论》第6卷,第1辑。

¹⁴ ¹³ 王秀梅:《从苏丹情势分析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补充性原则》《现代法学》2005年第6期,第180-181页,第184-185页。

¹² ¹⁴ 杨力军:《安理会向国际刑事法院移交达尔富尔情势的法律问题》,《环球法律评论》2006年第4期,第459页、第462页。

⑧The Associated Press “Indictment Is Biggest Test for Sudanese Leader”, July 21, 2008

⑨Opheera McDoom. “Darfur Rebels Welcome any ICC Warrant for Bashir”,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uly 12, 2008; “Darfur Re-

els Condemn AU on ICC Warrant”, *Reuters*, July 22, 2008

⑩Sara Darehshori “Doing the Right Thing for Darfur”, *Los Angeles Times*, July 15, 2008; Roba Gibia. “ICC Indictment Let President al-Bashir Prove Himself”, *Sudan Tribune*, July 22, 2008; Sarah Ekleeh “Sudan’s President Pays Defiant Visit to Darfur”, *The Associated Press*, July 23, 2008

¹¹ Lydia Polgreen and Marlise Simons “The Pursuit of Justice vs. the Pursuit of Peac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uly 11, 2008; David Rieff “Justice Is the Enemy of Peace”, *Los Angeles Times*, July 20, 2008

¹² The Associated Press “Prosecutor Denies Political Timing in Darfur Case”, July 17, 2008

¹⁴ The Associated Press “Sudan Bids for UN to Block Darfur War Crimes Prosecution”, July 14, 2008; Reuters “U.N. May Want to Suspend EC Action on Bashir”, July 21, 2008

¹⁵ The Associated Press “African Union Seeks to Delay Indictment against Sudanese Leader”, July 21, 2008

¹⁶ Jeffrey Gettleman. “Sudan’s President Goes on Tour”,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24, 2008

ICC and Darfur Issue in Sudan

LIU Hongwu¹, WANG Meng²

(1. 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China;
2. Institute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Abstract The Darfur issue in Sudan has become a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hot spot in recent years. In July 2008, the prosecutor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CC) accused al-Bashir, President of Sudan, of genocide and other crimes in Darfur, which would complicate the resolving of the issue. The present paper is an analysis of ICC’s roles therein and the future trends and possible outcomes and influences of the issue.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CC); Darfur; Omar Hassan Ahmad al-Bashir

(责任编辑 钟晨音)